

# 康熙皇帝与祭禹新解

◎ 刘丽萍

**摘要：**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亲祭禹陵的皇帝。他对祭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清代黄河改道的客观需要。因此，其在当政期间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祭禹旧制的学习、祭祀新规的制定以及亲祭禹陵、遣官祭禹都力行躬行，对后代帝王影响深远。

**关键词：**康熙祭禹 沟通满汉 黄河改道 祭禹制度

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最长、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当政期间积极学习汉族祭祀文化，加强了满汉两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比如其祭禹，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对禹祭旧制礼仪的学习、到祭祀新规制定的审慎思考，再到亲身赴会稽祭禹、遣官祭禹，都说明了康熙对华夏开国皇帝大禹的重视。

## 一

为什么要祭祀？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政策；二是清代黄河人工改道的需要。

先谈谈康熙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国策，在祭禹方面的种种作为。

### （一）康熙对周代以来中华祭祀文化制度的学习和肯定

依据《礼记·祭法》：“‘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sup>①</sup>又《礼记·祭法》中“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颛顼而宗禹”。<sup>②</sup>大禹已经成为祖先神接受后代的祭拜，夏朝开国以来对黄帝、鯀、颛顼和大禹都是举行帝王大祭祖先神的仪式的。周代设立了古代成为祀主的五大标准，并且将尧舜禹汤文武并列，为后代帝王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康熙亲祭大禹前曾在礼部的谕旨中提到“兹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万世永赖，应行亲诣旨，以展企慕之忧”，表明对汉族奉祭圣王标准的认可。

祭禹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团结民众。《国语·鲁语上》陈述了古代圣王制定祭祀制度的法则，称述了大禹因为以德修鯀之功，位列“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鯀而宗禹”之中，接受后代占祭；另“少康中兴”的季杼，率领大禹的后裔恢复夏后氏的天下，依靠的就是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原文如下：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sup>③</sup>

正如何仁富教授在《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sup>④</sup>文中，提到的儒家所重视的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三祭的宗教价值与意义是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调的宗教精神；是“人之本心本性即天性天心”之天人合德之教。中国传统之宗教性的三祭，因其不重祈求而重报恩，故此祭中之精神，为一绝对无私之向上超升伸展，以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求与之有一精神上之感通。

## （二）康熙是帝王祭禹史中的实践者

先秦时期，夏禹与黄帝、尧、舜同列祀典。自汉以后，累代在京师立庙，奉祀先代创业之主、有道明君，夏禹均在其列。会稽（绍兴）是大禹陵寝所在，自夏启肇始，祭会稽大禹陵成为历代官方祭祀大禹最重要的场所。历代王朝祭祀大禹，逐渐形成皇帝遣使祭祀、越州长官致祭的制度。“祭禹”这种古老的仪式，传承和发扬了大禹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有利于激励民心和祖国的统一。

夏启，绍兴帝王祭禹传统首先发起者。《吴越春秋》云：“启使岁时祭禹于越，立宗庙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无余于越，使祠禹。至勾践迁都山阴，立禹庙为始祖庙，越亡遂废也。”（案：今禹庙在会稽山下）启遣使每年祭日来越祭禹，并在南山（今南镇会稽山）上建立了宗庙。大禹以下第六代君王是少康，曾封自己的庶子无余到越地来，成了守陵人。以至于到了春秋时的越国勾践正式“立禹庙为始祖庙”。

秦始皇，帝王亲祭大禹先行者。秦代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上会稽，祭大禹”（《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是到大禹陵亲祭大禹的第一位皇帝，其意义重大，由此开启了祭禹祀典的最高礼仪。秦二世胡亥继位后，为彰显其父始皇帝的功德，也于二世元年（公元 209 年）春至会稽祭禹。《史记·封禅书》：“二世元年（前 209）春，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此后大多是皇帝派遣官员的遣祭、官祭。

康熙一帝王亲祭禹陵传承者。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都曾至绍兴禹陵亲祭大禹。《清史稿·本纪第七》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清圣祖“二月辛丑，上驻苏州。……辛

亥,渡钱塘江,至会稽山麓。壬子,祭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康熙以“三跪九叩”——祭祀最高的礼仪“大祀”大禹,又书“地平天成”勒石,可见其对大禹功绩的认可,对祭禹传统的认同和意义的深刻认识。

除此之外,康熙在位时,十次派遣官员到会稽祭禹:

康熙七年(1668年),遣周之桂致祭;

康熙十五年,遣李廷松致祭;

康熙二十一年,遣徐诰武致祭;

康熙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神主升祔太庙礼成,特遣色特告祭;

康熙三十五年,遣王材任致祭;

康熙三十六年,皇帝“亲征漠北,荡涤寇氛,廓清边徼,永靖兵革”特遣王焯告祭。

康熙四十二年,遣李旭升致祭;

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初患“剧疾”,后“平复如初”,特遣卢起龙告祭;

康熙五十二年,“适当六旬初届,所幸四方宁谧,百姓义和,稼穡岁登,风雨时若”,特遣周起渭告祭。

康熙五十八年,孝慧章皇后神主升祔太庙礼成,特遣田文镜告祭。<sup>⑤</sup>

### (三) 康熙在位时修订了祭禹的制度

唐代曾在《旧唐书·礼仪四》的礼制中对历代先王祭祀进行了梳理,确定了其祀主帝王、配享功臣以及祭祀地点。其中,关于大禹的内容是“夏禹,伯益配,祭于安邑”。<sup>⑥</sup>配食就是附祭,配享。配食并非合葬,这是两种行为。配食是让亡灵在同一祠庙里共享子孙的祭品,让后死者附于先灵合祭。为什么配食的是伯益呢?《史记·夏本纪》中提到伯益曾是助禹治水成功的功臣。“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sup>⑦</sup>祭祀地点为什么定在山西安邑呢?因为安邑是古代是夏朝都城之一,位于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

那么康熙祭禹为什么不去山西安邑,而到浙江会稽呢?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位“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又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sup>⑧</sup>所以说大禹葬所定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下是有史可查的。康熙应是仔细考察大禹史料后才做出决定的。这里补充一下后代帝王定立祭禹地点时的史料分析,《旧唐书》将禹庙设在河北县;《宋史》《金史》《元史》将禹庙建于黄河一代的平阳、河中府(今山西运城一代),禹祠则建在绍兴会稽。到了《明史·礼四》中才出现“四年,礼部定义,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sup>⑨</sup>由此,从明代开始大禹的祭祀才正式定立在浙江。相关信史资料如下:

乙丑,次陕州,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

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

——《宋史·卷二·本纪第二》

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

——《金史·卷三五·志第一六·礼八》

夏四月丙戌朔，大军树栅凿堑，围瓊于济南。丁亥，诏博兴、高苑等处军民尝为李瓊胁从者，并释其罪。庚寅，命怯烈门、安抚张耕分邢州户隶两答刺罕。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

——《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

到了清代，康熙考察汉人旧制认同《明史》所修。其祭禹会稽，既上承其父顺治帝，又下启其孙乾隆帝，又不断完善补充祭禹制度，深化了对华夏一统的凝聚作用。依据可参考《清史稿·礼三·吉礼三》对顺治帝时期制定帝王陵寝祀典制度的完整的记录：从伏羲帝到明代崇祯皇帝对历代帝王及其祭祀地点进行了规定，凡二十八地、陵寝四十处；浙江祀会稽大禹陵寝。并且规定“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如原文：

（顺治帝）八年，定帝王陵寝祀典，准宁伏羲，滑县颛顼、帝喾，内黄商中宗，西华商高宗，孟津汉光武，郑周世宗，巩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赵城女娲，荣河商汤，曲阜少昊，东午唐尧，中都轩辕，咸阳周文、武、成、康，泾阳汉高祖、唐宣宗、咸宁汉文帝，长安宣帝，富平后魏孝文帝，三原唐高祖，醴泉太宗，蒲城宪宗，鄠神农，宁远虞舜，会稽夏禹，江宁明太祖，广宁辽太祖，房山金太祖、世宗，宛平元太祖、世祖，昌平明宣宗、孝宗、世宗，各就地飨殿行之，或因陵寝筑坛，惟元陵望祭。十六年，幸畿辅，亲酌崇祯帝陵，谥曰庄烈愍皇帝。

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康熙二十年，滇乱平，遣官致祭，颁册文、香、帛，给黄伞一，御仗、龙熏各二，凡成武功，皆祭如典。二十三年，南巡，道江宁，诣明太祖陵，拜奠。谕有司巡察，守陵人防护。越五年，巡会稽，祭禹陵，祝文书御名，行三跪九拜礼。躅江宁，祭明太祖陵，如祀禹仪。凡时巡祭帝王陵寝，仪同祭庙，率二跪六拜，兹盖殊典云。

（乾隆）十六年，选妣氏子姓一人，授世袭八品官，奉祀禹陵。

——《清史稿·礼三·吉礼三》<sup>⑩</sup>

#### （四）康熙时期建立的祭禹新规及其对后代帝王的影响

清代按例，至会稽夏禹陵寝致祭的，有皇帝（朝廷）遣使祭，有司岁春秋二仲月祭。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凡登基授受大典，上尊号、徽号、万寿节，皇太后万寿节，册立皇太子，凯旋奏功，皆致祭陵庙。祭文香帛，遣官自京斋送。凡是巡祭帝王陵寝，仪同祭庙，一

律二跪六拜。但是康熙、乾隆巡会稽,祭禹陵,均破例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到了(乾隆)十六年,选妣氏子姓一人,授世袭八品官,奉祀禹陵。康熙帝祭祀大禹的行为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清一朝,共有8位皇帝遣官祭禹。康熙和乾隆两位是亲祭的皇帝;遣官祭禹自从顺治帝1651年首开先例后,康熙朝共10次遣官来祭;雍正朝共3次;乾隆共18次;嘉庆共6次;道光共3次;咸丰1次;光绪3次。可以说康熙是清朝在祭禹方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为后世皇家认同汉人祭祀文化做出了表率。

## 二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河工破坏严重,黄河经常泛滥决口,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又严重威胁着漕运的安全。这就直接关系到清朝经济的生命线,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因此,治理黄河成为当务之急。

早在顺治皇帝时期,黄河几乎是年年决口。《清史稿·河渠一》中载顺治一朝18年中仅大的决口多达20次。<sup>①</sup>黄河每年都会发生决口,甚至一年数次决口,在同一个地方数次决口也时有发生。黄河大的决口主要集中在中游的河南以及山东和安徽的交界处。康熙初期河患有增无减,特别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任河道总督以前,黄河连年决口,有时一年数次。如康熙九年,绝曹县牛市屯;又决单县谯楼寺,高邮运河之茶庵清水潭,江都运河之东堤四浅。在康熙元年至十五年(1676年)期间,黄河决口就有67次。<sup>②</sup>黄河决杨家庄200余丈,至康熙二十年才堵塞这个决口,给沿河两岸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其中河南、苏北广大地区深受水患之苦。此时,黄河的河患也使得长江下游江浙的情况严重起来,危及运河及漕运的畅通。随着靳辅在康熙十六年对黄河大修的开始,到了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大修各堤工的完成,再就是康熙帝的六次南巡,重视河工,黄河水患大大减少。此后,黄河虽有决口,但危害已经减小。黄河约50年没有大的危害。

清代《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登载了一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拜谒大禹陵时写的诗《谒大禹陵》:

古庙青山下,登临晓霭中。  
梅梁存旧迹,金简纪神功。  
九载随刊力,千年统绪崇。  
兹来荐繁藻,瞻对率群工。<sup>③</sup>

康熙的此次大禹陵拜谒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当时的重要背景是黄河治理已经初见成效。自从康熙十七年到二十年,三年共完成导黄入海,改移清口、高家堰、清水潭、归仁堤、皂河等六大工程。由于主管治理河务的靳辅和兵部尚书等巡河大臣在治河问题上意见龃龉,才导致康熙此次南巡。在历查河道之后,康熙于返京的前一个星期,拜谒了大禹陵。应该说,此次拜谒,康熙的心情是兴奋的。千百年来黄河水患终于有了初步治理的显著成果,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康熙自问比起大禹,或许尚有不及处,但这毕竟

是千百年来圣王帝君少有之作。所以，康熙怀着豪迈兴奋的心情肯定大禹“九载随刊力，千年统绪崇”，这是对大禹治水随山刊木，墮土浚川的功绩的认可，同时也暗含了对自己治黄业绩的高度肯定。大禹治水的“疏导”思路是“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把洪水导入长江，排入大海；与此同时，用堵塞之法，迫使水流改道以保证河流按照预定轨道进入大海。同理，康熙面对黄河水患，不仅仅吸收了大禹疏导和堵塞的双重办法，还发明了以水治水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洪泽湖水和淮水共挡黄河之水，从而解决黄河倒灌问题，确保一方平安和漕运顺利。至今仍在禹陵禹庙的楹柱上留有当年康熙御题的对联“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体现了康熙对大禹治水和治国思想的精粹概括；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代帝王永远缅怀疏导江河淮汉的大禹，永远思念其人其德；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总能感受到那种精粹统一、顺从天理的精神。

### 三

康熙帝上承顺治帝，下启雍正、乾隆，其作为盛世的缔造者在沟通满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是清朝第一位亲祭禹陵的皇帝，他对祭禹的重视，一方面是满族入主中原，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的国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清代黄河连年河患、影响漕运，急需如大禹般治理水患以便安邦的客观需要。因此其在主政期间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祭禹旧制的学习、祭祀新规的制定以及亲祭禹陵、遣官祭禹都毕力躬行，对后代帝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注释：

- ①② [元]陈澧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6 页、第 525 页。
- ③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65 页。
- ④ 何仁富：《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 7 期，第 64 - 68 页。
- ⑤ 沈建中：《大禹陵志》，研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 页。
- ⑥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909 页。
- ⑦⑧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51 页、第 83 页。
- ⑨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92 页。
- ⑩⑪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525 - 2526 页、第 3715—3768 页。
- ⑫ [清]靳辅：《治河奏绩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9 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49 页。
- ⑬ [清]《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绍兴县地方志委员会 1936 年，第 2 页。

（刘丽萍，女，1981 年出生，籍贯山西阳泉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先秦文学、神话学）